

ANCIENT POTTERY & PORCELAIN OF WENZHOU

温州古陶瓷

温州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

温州市图书馆

32
4

温州古陶瓷

ANCIENT POTTERY & PORCELAIN OF WENZHOU

温州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

图版说明 伍显军

摄影 孙之常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印制 陆 联

责任编辑 姚敏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州古陶瓷/温州博物馆编.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10

ISBN 7-5010-1294-6

I. 温… II. 温… III. 古代陶瓷-温州市-图录 IV. K876.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2539 号

温州古陶瓷

温州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慕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16 12.5 印张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294-6/K·549

定 价: 158.00 元

目 录

温州陶瓷考古与温州博物馆藏陶瓷器	蔡钢铁	1
图版目录		15
图版		21

温州陶瓷考古与温州博物馆藏陶瓷器

蔡 钢 铁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东濒东海，南与福建省毗邻，西与丽水市相连，北和台州市接壤。境内地势，从西向东呈梯状倾斜，西部为浙南山区，迤东高度逐渐降低为丘陵地，东部是沿海平原；绵亘有洞宫、括苍、雁荡诸山脉。温州市下辖十一个区、县、市，总面积 11784 平方公里。平原地区土地肥沃，河流交错。沿海岛屿众多，港湾密布。瓯江、飞云江、鳌江三大水系由西向东注入东海。温州的气候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温暖，雨量丰沛。山间盆地、河谷和滨海平原的冲积土壤很适宜农作物的栽培。丘陵地的土壤多半是红壤或黄壤，植被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树为主。

温州历史悠久，远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夏、商、周三代为瓯（或作沔、欧）地。秦统一全国后属闽中郡。西汉惠帝三年（公元前 192 年）为东海王（俗称东瓯王驺摇）都地。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 年）析章安县东瓯乡置永宁县。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 年），建立永嘉郡。唐高宗上元二年（675 年），始置温州。此后历一千三百多年，州名沿用至今。

温州陶瓷业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先民已能烧制陶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开始烧造印纹陶。到了晚商至西周时期，又创造了原始瓷器。东汉晚期，工匠们在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技术的基础上，成功地烧造出成熟的青瓷。温州地区的瓷窑，后人称之为瓯窑。六朝时期，瓯窑的制瓷技术更趋成熟，地方特色更为明显，进入繁盛阶段。唐、五代时期，瓯窑已使用匣钵装烧瓷器，而且在器物造型、纹饰和釉色方面都有新的创造。北宋时期，瓯窑继续发展，温州市区的西山窑以品种繁多、制作精湛和釉彩淡雅晶莹而负盛名。南宋以后因龙泉窑兴起，温州地区生产龙泉风格青瓷的窑场不断增加，瓯窑逐渐衰落。明清时期，由于景德镇瓷业的兴盛，温州地区的制瓷业除个别窑场仍在生产外，已基本停烧。

温州博物馆建于 1958 年，至今已有四十多年历史。馆藏颇具规模，尤其是陶瓷器

藏品，种类丰富，精品众多，总数达一千五百多件，可谓陶瓷艺术的宝库。陶瓷器藏品的年代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迄近代，是温州数千年历史的实物见证，其中不乏国家一级珍品，并有相当数量的纪年瓷器。部分藏品造型独特，历史和艺术价值都很高，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不少珍品被《中国美术全集·陶瓷卷》、《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国宝大观》、《龙泉窑青瓷》和《浙江纪年瓷》等图录收录。藏品中主要有西周至西汉的原始瓷，东汉至元代的瓯窑系列瓷器，宋元时期的龙泉窑瓷器，温州出土的北方窑口陶瓷，以及色彩绚丽的明清彩瓷。

一

温州制陶史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早在五千多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先民已经掌握了制陶技术。近五十年来，温州地区发现的各个时期的古文化遗址达一百多处，主要分布在瓯江和飞云江两岸，遗址中出土了各种形制的陶片，有夹炭陶、泥质夹粗砂红陶、泥质红陶、彩绘陶、泥质灰硬陶和几何印纹硬陶等。可辨认的器物有釜、罐、壶、豆、尊、钵、盆及网坠、纺轮等。温州地区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遗址，是永嘉县岩头镇下游8公里大小楠溪交汇处的渠口乡渠口村遗址。1993年经省市文物部门调查，在渠口村砖瓦厂取土坑距地表约3米处，发现了包含陶片、石器、红烧土、灰烬、炭屑的文化堆积，这是浙南发现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原生堆积层，厚20~40厘米。陶器有夹砂红陶、器表橙红色的夹炭陶和泥质灰陶，器形可辨有釜（或为鼎）、豆、罐。釜的残片上有绳纹。发现的石器均经过精磨加工，石器、陶器的总体感觉似属河姆渡文化传统，陶器、石器特征显示其年代大体上与河姆渡文化第四期相当。在瑞安北龙大坪、仙降鹤屿山和泰顺莒江龙珠山等遗址都发现夹炭陶，呈色不纯，质地疏松，胎壁较厚，无纹或饰粗浅的篮纹、直条纹。含砂、含炭的比例稍高，具有耐火、不易破裂的特点，器形主要为炊器和饮食器，陶器特征近似河姆渡出土的夹炭陶。飞云江两岸是先民生活的主要区域。1997年配合珊溪水库建设，考古工作者对飞云江上游的泰顺司前狮子岗遗址和百丈下革牛头岗遗址进行调查清理。司前狮子岗遗址出土的陶器有印纹硬陶、黑褐色彩陶、黑陶等。器形比较简单，多为罐、钵、甗等。印纹硬陶片纹样有席纹、篮纹、斜方格纹、曲折纹、云雷纹等。黑褐色彩陶总数不多，但引人注目。施彩集中在罐类器的口、肩部，施彩方法有加点、画线、涂刷等几种。狮子岗遗址的年代约相当中原的夏代。百丈下革牛头岗遗址总体面貌及所体现特征似较狮子岗进步。陶器以印纹硬陶为主，泥质陶大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彩陶很少。器形主要是罐，长颈、方折肩、圜底内凹是陶罐造型的基本特征。印纹硬陶纹样有条纹、篮纹、方格纹、菱形方格纹、云雷纹、叶脉纹、席纹等。着黑陶数量少，黑色较纯正。牛头岗遗址的年代约相当中原的商代。飞云江中游的文成县珊溪鲤鱼山遗址，采集到打制石铤和拍印很

浅条纹的着黑陶、云雷纹硬陶，着黑陶表面微具光泽感。这些器物特征显示，这里的文化较牛头岗更进步。飞云江下游的瑞安市发现了先秦文物点达五十处，为浙南之冠。瑞安隆山发现了四座土坑墓，随葬器物以石器为主，其中 10 号墓出土两件带黑衣的陶器，陶罐圜底内凹，颈下肩部有两个竖向贯耳。陶器特征显示，墓葬年代约相当中原的商代。进入青铜时代，瓯江南北各遗址都以印纹硬陶为主要文化内涵，主体面貌一致。但瓯江以北地区至今很少见到施黑褐色彩的彩陶器。着黑陶虽然有少量发现，但也应是受瓯江以南文化影响的产物。而着黑陶在瓯江以南地区，从松阴溪源头的好川岭头岗到下游沿海丘陵地区、飞云江流域则普遍发现。从对飞云江上游泰顺狮子岗出土的彩陶和着黑陶着色剂的特征观察，两者原料相同，施彩方法有异。着黑陶工艺可能源于黑褐色彩陶，两者具有直接的承继关系。

约在晚商至西周时期，温州出现了原始瓷器。瑞安莘塍岱石山、仙降金平山和山根凤凰山的墓葬中都出土了原始青瓷和原始黑褐瓷。瑞安岱石山石棚是浙南比较丰富完整的先秦墓葬资料。1993 年发掘，共清理石棚和大盖石墓二十七座。根据随葬品排比分析，其年代大致在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石棚出土器物有原始瓷、素面硬陶、印纹硬陶、泥质陶、夹砂陶、青铜器、石器等多种不同质料的器类，其中以原始青瓷的数量最多，包括黑陶在内的素面硬陶次之，泥质陶和夹砂陶数量极少。原始瓷和陶器器形有豆、碗、孟、罐、甗等饮食和盛储器。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在乐清白鹭屿土坑墓、泰顺锦边山遗址亦有发现。汉代生产原始瓷的窑址在永嘉县罗东乡芦湾村小坟山。器物有甗、甗、罐、钵、碗等，质地坚硬，形制规整，纹饰以窗棂纹、方格纹、水波纹为主，施青灰釉和褐釉。

东汉晚期，陶瓷工匠在长期烧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摸索，提高工艺水平，终于生产出成熟的瓷器。目前发现的东汉瓷窑都在永嘉县，分别为罗东乡箬隆村后背山窑、芦湾村小坟山窑、芦田村殿岭山窑。制品分青瓷和黑瓷两类，器物有甗、罐、钵、壶、甗、盆、洗等。青瓷胎骨白中偏灰，致密坚硬，充分烧结，釉色为淡青或青黄，釉质透明，色泽清雅。黑瓷施黑釉、黑褐釉，釉层不匀并有剥落现象。纹饰有方格纹、斜方格纹、米字纹、垂线三角纹、水波纹、弦纹等，与印纹硬陶、原始瓷相似，尚未形成独有风格。而罗东乡芦湾村小坟山窑反映的从陶到原始瓷再到成熟瓷器的演进过程更具代表性。它的遗物可以明确地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印纹陶和黑皮陶，属温州地区东汉墓中常见的器物，温州市郊杨府山东汉墓中出土的原始瓷罐（图版 25），面貌特征与窑址所见的同类器物一致。第二类是以弦纹装饰为特征的青褐釉制品，器形有甗、钵、罐、壶、甗、盆、洗等，坯体断面较粗，胎釉结合欠佳，釉色深浅不一，具有一定的原始瓷特征，拍印的几何形图案花纹，也常见于上虞和宁波等地被认定为东汉晚期的窑址遗物中。第三类为青灰绿釉瓷器，是具有成熟形态特

征的瓷器制品，并采用孟形齿口垫具和三足支钉支烧，这是浙江三国—西晋时期窑址中普遍发生的现象。由此可见，温州瓷业生产的发生期，即由原始瓷向成熟瓷器的演进过程，是在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与浙江许多地方的瓷业进程大体同步。因温州古属东瓯，且窑址大都分布在瓯江流域，故温州一带的窑址被后人称为瓯窑。

六朝时期，瓯窑瓷业得到迅速发展，制瓷技术提高，产品种类增多，制瓷业位居江南众窑前列，为瓯窑的进一步发展和自成体系奠定了基础。

永嘉县罗东乡箬隆村后背山 1 号窑址是东汉至三国时期的窑址，窑壁采用土坯砖错缝平砌而成，内侧烧结坚硬，外侧呈暗红色，说明窑温较高，它的结构特征与上虞市联江帐子山和鞍山的汉—三国时期窑址相似。从三国墓葬出土的瓷器看，瓷器生产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釉色多数为黄绿，部分为淡绿，通体施釉较多，已经基本掌握釉料配方和施釉技术。流行纹饰为弦纹、水波纹、斜方格纹。集中表现此期造型装饰技艺的当属堆塑罐。瑞安场桥龙翔寺三国墓出土的直筒形堆塑罐，造型独特，通过堆塑、镂刻和贴塑等工艺，在罐上塑造了人物、鸟兽、建筑和粮仓等立体形象，表现了较高的堆塑技艺。温州杨府山三国墓出土的一对筒形器，造型简朴自然，为其他窑系所少见（图版 29）。

西晋墓葬发现较多，出土瓷器种类有日用器和明器等，数量以盘口壶、鸡首壶、罐和碗居多。平阳县鳌江种玉西晋元康元年（291 年）墓出土的一批明器最富代表性，品种有堆塑罐、灶、鸡笼、狗圈、猪栏、水井、镢斗和吊桶等（图版 30~34）。此期青瓷釉色多数为灰绿和淡灰绿。多数釉层薄匀，光洁莹润。常见纹饰是弦纹、水波纹、羽翼纹、斜方格纹、联珠纹。西晋时在瓷器上普遍采用压印、刻划、粘贴、堆塑和点彩等造型装饰工艺。如狮形烛台，采取模印与刻划、写实与抽象相结合的手法，狮子张口露齿，双目圆睁，狮毛则卷曲有致，疏密得当；茧形虎子口部模印虎头，威武凶猛；蛙形水盂堆饰的青蛙，仰首伸肢，状似在水中漫游。明器中的动物造型亦姿态各异，如俯食于槽的肥猪，匍伏前视的健犬，鸡笼内外觅食的雄鸡，无不栩栩如生。常见的装饰，是在器物的口沿和肩腹部刻划弦纹、水波纹、羽翼纹和压印斜方格纹、联珠纹等。瓯窑与越窑、婺州窑在装饰上明显不同的是，瓯窑尚未发现佛像装饰，贴花铺首和联珠纹也极少使用；而越、婺两窑，贴花佛像却是常见装饰。

东晋是瓯窑瓷业大发展的时期。已发现的此期墓葬很多，尤其是纪年墓，东晋绝大多数年号的墓葬都有发现，随葬瓷器也非常丰富。在温州市郊双屿和杨府山，永嘉罗浮和屿塘山、瑞安桐溪芦蒲、苍南藻溪等地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瓯窑瓷器。这些瓷器胎质细腻，已不含杂质，瓷胎绝大多数呈灰白色；釉色淡雅，多数为灰绿，说明窑匠的烧造技术已趋成熟，能比较稳定地控制窑炉温度和还原气氛，生产出釉色纯正的青瓷。常见器物有壶、瓶、罐、洗、钵、碗、碟、杯、砚、水盂、烛台、香熏、唾

壶和虎子等，新品种有双口罐、盒、尊、灯、榻和龟形水盂。西晋流行的耳杯和堆塑罐及其他明器少见，且逐渐消失。造型装饰有了明显的变化，注重器物造型的合理与匀称。装饰风格由繁复逐渐趋向简朴。以动物形象作为造型主体的瓷器较多，如牛形灯、虎形灯座、狮形烛台、羊形器、龟形水盂、蛙盂等；有的取动物身体局部来装饰器物，如鸡首壶、虎子；还有的将雌雄动物的形象塑造于瓷器，如瑞安隆山东晋6号墓出土的雌雄鸡首壶对壶，一雌一雄，相配成对。出土于瑞安丽岙的牛形灯是此期造型艺术的佳作，灯管被塑成一头直立的牛，牛头前探，作拟人的插腰姿式，嘴及双眼点施褐彩，双目凸出，炯炯有神，造型独特，颇具匠心。

弦纹仍是此期青瓷的主要纹饰之一，约有三分之一的瓷器装饰有弦纹。它之所以继续大量使用，主要在于，凹弦纹处可形成绿色的积釉圈带，与浅绿的底色相辉映，增添层次感。弦纹装饰与东晋青瓷素雅的风格十分吻合，这种简洁的装饰效果在瓯瓷淡雅的釉面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此期，作为佛教的象征——莲花纹，已成为建筑及日用器物上普遍采用的装饰题材。瓯窑也开始在瓷器上装饰莲花图案，最常见的是，在壶、罐、碗、盏托等器物上刻划莲瓣纹。

此期瓷器上的褐彩装饰得到广泛应用。温州博物馆收藏的东晋瓯瓷中，约有三分之一点饰褐彩。温州双屿雨伞寺东晋升平三年（359年）墓出土的十一件瓷器中，有六件点彩。褐彩的装饰形式丰富多样。有的在器物的口沿、肩腹和盖面上点饰一圈或数圈褐彩；有的在器物的盖面上以钮为起点，向外点饰四条褐彩线，布局呈十字形；有的在器物的腹部点彩组成连续菱形图案；有的在鸡首壶的腹部点彩呈连续交叠垂帘形，区间填联珠花；有的在碗的外壁点饰富有装饰性的联珠花；还有的在器物的口沿对称点彩，有对称二点、四点和对称二点四组、三点四组、三点三组等形式。雨伞寺东晋墓出土的褐彩鸡首壶，用褐彩在壶身点饰垂帘纹、联珠纹、联珠花，组成连绵不断的图案画，清新自然，素雅大方，堪称褐彩装饰的杰作（图版45）。褐彩装饰不仅可以组成多种花纹图案，还可以利用圆点的大小、多少，褐彩的浓淡、晕涩而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东晋瓯瓷上还出现用褐彩书写的文字。永嘉夏甌山窑址出土的一件瓯窑青瓷残砚，砚径较大，达28厘米，底面用褐彩书写文字，尚存“山者文苑”四字，运笔流畅自如。

东晋窑址目前仅发现永嘉县罗东乡夏甌山一处，且大部分堆积已遭破坏。从采集到的遗物标本看，产品种类较多，尤其是日常生活用器，主要有碗、罐、壶类。碗的胎体厚重，质地致密坚硬，呈灰白色，釉色青绿，具有很好的光泽感，釉层薄而均匀，口沿外侧多有一道凹弦纹，流行点饰褐斑。根据浙江纪年墓出土的瓷器资料，结合南京地区东晋中晚期随葬瓷器中大量的瓯窑产品，特别是一些世家大族墓出土的瓯窑精品，与同时期的越窑比较，东晋瓯窑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越窑。

南朝瓯窑的瓷器品种比东晋有所减少。此时又出现了一些新品种，有竹节颈盘口壶、莲纹盖罐、瓜形盖罐等。器物造型注重实用与装饰的统一，器形比前代更高，多秀丽瘦长，这种风格的形成应与门阀士族“秀骨清像”的审美倾向有关。还有一些明显特点，如鸡首壶的鸡首较高，并出现凤首壶；器腹多饰莲瓣纹；罐多用四桥形系或四复系；盏托增多；动物造型的瓷器减少。莲花作为主题纹饰得到普遍应用，与南朝佛教的兴盛有直接关系。瑞安塘下凤山梁天监九年（510年）墓出土的一批青瓷，大都装饰莲花。纹饰刻划纤细，制作精致，造型庄重，是当时社会普遍崇佛的具体体现。其中两件球形莲纹盖罐造型一致，装饰风格却不同。一件划刻结合，莲纹端部凸起，呈浮雕状，立体感强，瑰丽明快，富阳刚之气；另一件划饰纤细的重线莲纹，线条细柔规整，在釉层下若隐若现，淡雅含蓄，寓阴柔之美。两罐虽然风格迥异，但作为对罐，却相映成趣，和谐悦目，为瓯瓷上乘之作，充分体现了南朝瓯窑精湛的造型技艺。

南朝窑址目前仅发现两处。一处位于乐清市白象乡馒头山，一处位于瓯海区三垟乡樟岙村山窑底角山。馒头山窑器形有钵、壶、瓶和碗等，形制与夏壁山窑相近，胎质坚硬，呈灰白色，釉色有青灰色和混浊的青黄色两种，有细冰纹，光泽透明。山窑底角窑的器物有碗、钵、盏托、罐、壶等器类，均采用明火叠烧。器形特征与瑞安桐溪芦浦的南朝墓葬出土物相似，盏托的形制特征与宁波云湖南朝窑址同类器物相似。碗底多为假圈足式的饼形底足，盛行莲花瓣装饰。

六朝瓷业的长足进步，使瓯窑的影响和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它不仅供应本地区，还大量销往福建、广东、江苏等地区及建康（今南京市）、京口（今镇江市）等都市，成为皇室和贵族的生活用品。新中国建国前后，南京郎家山六朝墓和镇江跑马山临淮谢氏墓等地，就出土了一批精美的瓯窑瓷器。

唐至五代温州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瓷业发展较快。窑场数量多，规模大。烧造范围已不限于温州、永嘉等地，向南扩展到瑞安、泰顺等县，向西发展到丽水、龙泉等地。这一时期的窑场遗址发现较多，目前调查到的即已达到二十多处。分布地域得到明显的扩展，除瓯江下游的永嘉县东岸、罗溪、黄田三乡以外，在飞云江下游北岸，乃至鳌江南岸等地区，也陆续涌现出一些窑场，有的地方还形成了若干规模较大的窑址群落。从永嘉县罗溪乡启灶窑址采集的标本观察，制品种类较多，主要是碗、盘、瓶、壶、罐、盆、灯盏等日常生活用器，碗、盘类尤为多见。胎骨细腻致密，呈色灰白，具有很好的烧结形态，釉层匀薄、滋润，呈现淡青色调，一般通体施釉，惟底足部分露胎。器物造型周正，体态端庄，碗盘类制品或作平底，或作浅圈足，偶见玉璧形底足。器物中多数通体光素，但也有的碗内壁与内底作纤细的划花，布满展开的荷叶图案。

从墓葬出土的器物看，唐、五代瓯瓷产品种类繁多，与越窑大体相同，有壶、瓶、

罐、钵、碟、盘、碗、洗、砚、盒、盂、盏、熏炉、唾壶及明器桌、磨、灶、椅、杵、臼等模型，瓷器使用范围更为宽广。唐早期器物的造型特点是浑圆饱满，厚重大器较多；晚唐五代则突破前期稳重古板的格局，创造出精巧匀称、明快活泼的造型风格。胎体渐趋细薄，精致的小型器物增多。装饰工艺主要有印花、刻花、褐彩、堆贴和捏塑等。瓯窑擅长刻花工艺，常见纹饰有莲瓣、荷花、卷草、葵花、朵云、牡丹、缠枝花卉、双鱼和飞天等。温州杨府山出土的鱼纹执壶，扁腹，两面中间微凹，各细划双鱼纹，鱼有鳞鳍，双双相对，体态肥壮（图版 77）。苍南灵峰出土的飞云纹盒，盖面饰飞天童子纹，一作盘旋飞翔状，一作直立升浮状，飘带迎风摆舞，体态俊美自然，充满青春活力。至于釉色，唐早中期部分偏黄，晚唐至五代大多为灰绿和淡绿。釉质滋润如玉，胎骨细密，胎面平整光滑，呈色较白，胎釉结合紧密。除青釉外，还有部分为褐釉、黑釉和黄釉。褐彩也是唐、五代瓯窑的一种有特色的装饰形式，大多在罐、壶、水盂的外壁饰以大圆斑，或在器腹绘褐彩花草图案。

两宋时期，温州制瓷业达到了一个空前繁盛的新阶段。窑场遗址的分布情况表明，前朝开始烧造的绝大多数窑场仍在继续生产，瓯江南岸至飞云江下游两岸的瓷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兴盛和发展。在地理空间上，把北自瓯江下游北岸，跨瓯江至飞云江下游与鳌江以南的瓷窑，连接成南北向的一条宽阔的瓷业生产带。瓯瓷、龙泉瓷、青白瓷和青釉绘彩瓷四种类型的瓷窑共存，并且大体上各自有一定的基本分布范围。

宋代瓯窑窑场众多，重要代表有温州西山窑和瑞安外三甲窑。位于温州市西郊的西山窑址群是宋代瓯窑著名窑址。西山窑兴盛于北宋，结束于北宋末南宋初或稍晚。主要特征是胎骨灰白，胎壁较薄，坚硬细致。釉色以淡青为主，还有青绿、灰绿、黄绿和酱褐色釉。釉层匀净光滑，胎釉结合好。酱褐瓷和青瓷共存于一个窑中。造型出现柔和匀称、明快活泼的新形式，其中精致玲珑的小型器物不断增多。主要器形有碗、壶、盘、罐、瓶、杯、盏、盏托、碟、粉盒、水盂等。纹饰多采用划花、刻花和印花等手法，常见纹饰有莲瓣、莲蓬、葵花、荷花、菊花、牡丹、海棠、卷草、云朵、蕉叶、十字花以及双蝶、鸂鶒等，线条多粗犷遒劲。位于飞云江下游瑞安市陶山区的梅屿外三甲窑址，标本分三种类型。第一类制品的烧造年代在北宋。它的总体特征是胎色灰白，质地细腻，烧结致密；多通体施釉，釉层均匀，釉色纯净，呈淡青或青绿色；器物造型讲究，制作规整端巧，曲直有致，底足多外撇微卷或作卧足平底。采用匣钵装烧。流行刻划花装饰，碗盘类内底常见团形花草，也有双蝶或花鸟纹者。产品种类较丰富，有碗、盘、杯、壶、罐、瓶、盏托、粉盒、香熏、灯盏、烛台等。第二类制品的烧造年代在南宋。它的总体特征是制作比较粗糙，胎质不够细密，釉层稀薄，呈色青绿或青中泛灰，多为施半釉的器物，盛行刻划花装饰。制作质量和工艺水平以及烧成状况等方面，均趋向粗率，不如第一类制品。第三类制品，则以釉上绘褐色纹彩

为特征。第一类和第三类制品有着明显的时间差距，而第二、三两类则可能有着某种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平行共存关系。

青釉绘彩瓷器是青瓷中的新品种，特征是胎质粗细不一，以质粗而疏松类为多，少见胎骨细腻致密者。釉层极薄，常常缺乏光泽。产品种类不甚丰富，以瓶、钵、壶、罐类盛器为多，极少见到盘碗类食器。彩料中含有过高的铁氧矿物，呈现铁褐色。绘彩图案比较简单、草率，多为一种一挥而就的简笔纹样。也有在器腹上写字的（图版114）。这个品种出现在北宋晚期，盛烧于南宋，个别窑址延续至元代，如永嘉岩头下山坟窑。分布地域自飞云江下游北岸向北延伸，过瓯江到永嘉县楠溪江上游，以及乐清市清江以北的大荆镇一带。前述瑞安外三甲窑址第三类制品即属此类型的瓷器。

龙泉窑系青瓷窑址主要分布在瓯江下游、飞云江上游泰顺、文成二县珊溪水库淹没区，共有窑址约四十处。烧造年代分属于南宋中期至元代早期和元代中晚期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产品有壶、洗、碗、盘、盏、碟等，以盘、碗类器皿为大宗。胎色青灰，不甚细密。釉色有淡青、青灰两种。圈足浅而宽，器底厚重，内壁盛行刻划花装饰，纹样题材多为荷花、云纹、篾线纹及“S”形刻划纹，内底印“河滨遗范”、“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等吉祥语。

青白瓷系窑址主要分布在泰顺县境，即珊溪库区的几处青白瓷、青瓷、黑釉瓷三种制品共见的遗址和玉塔乡窑区。玉塔乡有七处青白瓷窑址，年代为北宋后期到南宋前期，1978年发掘了两处，获得了大量遗物。其釉色有青白、黄白和灰白之别，其中以青白者为最多最佳；器壁较薄，胎色多数灰白，胎质细密坚硬，叩之发音清脆；多为芒口，底则施满釉。釉面纯洁晶莹，颇具光泽感，釉的透明度较强。器物以素面为主，注重简朴实用，部分碗、盘内饰有卷草或篾状划纹，少量器盖和碗外壁还饰有莲瓣纹。宋代温州瓷业出现的青瓷、龙泉瓷、青白瓷和青釉绘彩瓷共存的局面，应与温州港的开发、市场的需求和对外贸易的扩大有密切关系。

随着龙泉青瓷的发展和外销量的增加，元代温州地区的瓷业发生很大变化。一批南宋龙泉窑系的瓷窑继续生产龙泉风格的青瓷，并出现一些新的同类窑场。而瓯窑青瓷窑场在龙泉青瓷和市场的影响下，渐趋衰落，有的转向生产龙泉风格的青瓷。元代龙泉系窑址大都集中在永嘉县境内，在桥头镇到朱涂乡一带就发现多处窑址，烧制年代集中在元代中晚期。而朱涂乡宋代老坟山窑产品与宋龙泉窑风格相似，说明永嘉一带的窑场在南宋时就已受到龙泉瓷业的影响，这也为元代大批龙泉系窑场在这里出现打下了基础。桥头眠牛山1号窑址是一处具有典型意义的元代龙泉窑系的窑址。产品有碗、盘、高足杯、三足奩式炉等。胎色比较白净，胎骨厚重而烧结致密，釉色以青绿釉为多，青中泛黄者次之，青绿釉者釉层厚而匀净，具有葱翠如玉的质感。盛行刻划花装饰，碗盘类口沿外侧盛行弦纹或弦纹带加刻若干组斜线纹，下腹部刻划粗线条

宽瓣仰莲纹，内底多戳印牡丹、葵花、秋菊、双鱼等纹，其间加刻有“庐江惠祖北记”、“清河”、“仁寿”、“西”、“丙”等店铺字号、标记或具有吉祥寓意的文字。

明清时期，温州地区的青瓷生产，除泰顺、瑞安等地少数窑场继续烧造，已基本停烧。在景德镇瓷业的影响下，此期出现了一批生产青花瓷器的窑场，分布在泰顺县洪口、瑞安市曹村和苍南县碗窑等地。明代青花瓷产品有碗、杯、盘、盏、洗、炉等，以碗为大宗。胎骨精细，釉质细密，釉面光滑。青料线条自然晕散，色调浓艳。青花纹饰有人物、树石、行舟、鱼藻、梅花、菊花、荷花等。清代青花瓷器，胎质不及明代精细，青料色泽浓重闪紫，绘图草率。

二

温州瓷业的发展，与当地发达的水上交通和港口贸易密不可分。温州是一座濒海城市，江河纵横，瓯江入海口即为温州港。温州先民素有航海的传统，善于驾船行舟。早在战国时期，温州已是中国海上交通线上九个重要港口之一。三国吴大帝赤乌二年（239年），官府在罗阳县横屿（今浙江省平阳县仙口山下）设置了官营造船工场——横屿船屯，它与建安的温麻船屯（今福建省连江县北）和番禺县（今广州市），都是江南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便捷的水上交通和古代居民熟练的航海技术，为温州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

隋代和唐代前期，温州的社会经济具有强烈的自然经济特点，安史之乱以后至五代时期，商品经济渐趋繁荣，海外交通和贸易开始兴起。日本学者桑原骐藏著《蒲寿庚考》载：唐代“福州、明州、温州以及苏州之松江等，皆贸易港也”。在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著《中日交通史》（陈捷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中，对唐时中日商船出入的主要港口，有详细的记载：自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年）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凡七十年间，中日商船停泊的地点为明州、楚州、苏州、松江口、福州、常州、广州、台州以及温州乐城县玉留镇等地。唐代温州的主要贸易国是日本，以民间私人贸易为主。尤其是在日本不再向中国“朝贡”后，民间贸易往来更趋密切。温州港经常有商船进出、停泊。大商人李邻德、张支信、李处人等，都自备船舶，往返于日本与温州、明州、台州诸港。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李处人在日本花了三个月时间，用楠木造海船一艘，航行六天，驶抵温州，进行贸易活动，首次开辟了由日本值嘉岛直达温州的新航线。当时商船运往日本的货物品种繁多，以经卷、佛像、佛画、瓷器、书籍、药品、香料为主，从日本带回的货物有砂金、水银、锡、绵、绢等。由于当时温州与日本之间商船往来频繁，一些日本高僧前来中国时，也有的顺便搭乘商船至温州登岸，以后再转赴各地。如日本名僧惠远即于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乘坐李处人的商船前来温州，然后去五台山朝圣。新罗（今朝鲜半岛）国王曾派王子带了大批礼

物来中国进行访问，途中遭遇台风，漂流至温州平阳附近海面，不幸遇难。后平阳百姓在新罗山立庙纪念他。

五代时，温州是吴越重要港口之一，设有博易务，瓷器、茶叶、蠲纸等是温州港出口的主要物资。温州的主要贸易国仍然是日本。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载：五代时“中日间的交通仍然不绝，商船来往分外频繁”，“开到日本的中国商船，似乎大都从吴越出发，横渡东中国海，经过肥前松浦郡的直岛，进入博多津港”。

唐五代对外贸易中，瓷器是一种重要的出口商品。日本著名古陶瓷专家三上次男在其所著《陶瓷之路》一书中曾提到在红海西岸的埃及旧库赛尔城遗址拾到许多的陶瓷片，其中有唐末、宋初的越窑系青瓷。在西亚伊朗境内沙里、达卡奴斯出土的可能是9至10世纪越窑系的陶瓷。在菲律宾看到“搜集的中国陶瓷从9世纪的越窑、越窑系的陶瓷开始……”三上次男先生对出土的浙江青瓷用了“越窑青瓷”和“越窑系青瓷”两种名称，他明确地把越窑瓷器与越窑系瓷器分开，显然是因一些青瓷与越瓷特征接近却又不尽相同，故定其名为“越窑系青瓷”。古陶瓷专家王舒冰先生认为：“越窑系青瓷包揽浙江境内宁绍平原原越国腹心诸窑和本省东南、南部的瓯窑、处州窑、龙泉窑，浙西的婺州窑系诸窑青瓷艺术在内。”可见，国内外学者所称的“越窑系青瓷”，一般是对浙江诸窑青瓷的泛称。由此推论，在国外发现的大量青瓷中，除了越窑瓷器，还有不少应该是接近越瓷的瓯窑、婺州窑等其他窑口生产的青瓷，且瓯瓷占有一定的比例。

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中，对海外出土的越窑系青瓷作了大量的介绍，认为出土地域之广，数量之多，产品之精，令人惊奇。他提到出土唐五代越窑系青瓷的地点有：埃及福斯塔特、爱扎布、库赛尔、东非沿海、伊拉克、伊朗赖伊、巴基斯坦斑波尔、印度马德拉斯城、印度尼西亚、日本等。上述地点出土的越窑系青瓷在器形和装饰上也与瓯瓷相吻合，如瓜棱形执壶、撇口斜腹璧形底碗、荷花碗、葵口碗、刻花盒、水盂等。

唐五代温州不仅外销本地瓷器，还外销国内其他窑口的瓷器。新中国建国以来，在温州市郊状元桥（地处港口）、双屿和塔下等地曾出土部分长沙窑青瓷、邢窑系白瓷和唐三彩陶器。如：长沙窑贴花人物褐斑执壶、邢窑系唇口璧形底白瓷碗、巩县窑葵口白瓷碗、唐三彩执壶、唐三彩杯、白胎绿釉执壶、深铁锈红胎绿釉双唇坛等。上述陶瓷器在唐五代都曾作为外销商品而大量出口。在广州、泉州、宁波和扬州等主要外贸港口城市大量出土这些陶瓷器和碎片。这些北方和内地窑场生产的陶瓷在沿海港口温州出现，从另一方面证明唐五代温州已开展对外陶瓷贸易。除外销本地青瓷，外地陶瓷器也汇集到这里转运出口。

两宋时期，温州的社会经济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宋室南渡以后，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徙，更促进了温州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北宋时，温州的商业发展已具规模。南宋时，店铺林立，商业更趋繁荣，温州成为浙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温州的土特产如漆器、蠲纸、瓷器、纺织品、瓯柑等，大都经海路贩销东南各省，其中瓷器、漆器等工艺品还远销国外。随着海上陶瓷之路兴起，温州的海外贸易也异常活跃。南宋初，温州设置对外海上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务。从此，温州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绍兴十五年（1145年）十一月，有日本商人携带硫磺、布匹等来华贸易，因风漂泊至温州平阳县仙口港，受到官府的妥善安置。温州城内还设立了多处接待外商的馆驿，如“待贤驿”、“容成驿”和“来远驿”等。外商抵埠，市舶机构官员亲自前往码头欢迎。温州设置市舶务后，港口桅樯林立，商旅云集，人称“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并出现了一批长期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如南宋的“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往来数十年”（洪迈《夷坚支丁》）。同时，也招来了许多外国商人，如南宋温州诗人徐照的《移家雁池》诗中就有“夜来游岳梦，重见日东人”之句。日东人即日本人。除了商人，一些有学问的僧侣也前来取经学法。南宋时，江心孤屿的江心寺和乐清雁荡山的能仁寺都是国内有名的寺院，常有外国僧人寄住。故徐照的《江心寺》诗中又有“两寺今为一，僧多外国人”之句。来温州的还有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如瑞安诗人陈则翁《回回僧人》诗云，“秋风响耳环，古怪聚人看，……亦有西来意，相逢欲语难”，描述这些来自西方的僧人，服装古怪，言语不通，引起当地群众围观的情景。

元代温州民间的海外贸易往来仍十分频繁。温州商船不断来往于各国港口，外国船舶也继续驶来温州经商贸易。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温州人周达观奉命随元朝使团出使真腊（柬埔寨），经六个月的海上航行抵真腊国都吴哥，第二年返航回国。回国后，周写了《真腊风土记》一书，记述了柬埔寨13世纪以来的社会状况、经济物产、风土人情、典章制度等，还记载了温州漆器在真腊广受欢迎的情况。元代至正年间，日本著名禅师大拙祖能与同伴数十人入元，从福州长乐县到温州江心屿，参拜了龙翔禅院的无言宣禅师，然后经温州北上。

宋元时期，随着海外对青瓷的需求，瓯窑、龙泉窑青瓷大规模外销。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就曾说过：“龙泉窑青瓷闻名于世界。这种青瓷和福建、广东两省窑业的青瓷，曾大量出口远销国外。”从国外考古发现看，北宋的越窑、瓯窑青瓷，南宋、元、明的龙泉窑瓷器残片广布于东亚、东南亚、南亚、埃及和东非、地中海沿岸沿线各国。

位于温州湾口的洞头岛海域，是古今船只进出温州港的必经之路。在洞头多处海滩和海底曾出土唐五代和宋元青瓷及其碎片。1988年在洞头港西北侧的后垄村发现一

处元代窖藏，出土龙泉窑系青瓷五十余件，器形主要有碗、高足杯、盘、碟。釉色以粉青和豆青为主，釉质滋润，釉层较厚，在碗、杯、盘的内底大多模印菊花、葵花、牡丹花，也有刻划“月影梅”图的，具有显著的元代装饰风格。这批窖藏瓷器的造型、胎骨、釉色以及纹饰诸特征均与永嘉县桥头眠牛山、钟山窑址的制品相同，应属温州本地所产。其器形和装饰风格亦与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中的瓷器相近，显然为外销商品。1984年在该岛西面的霓屿岛霓北乡，还发现了两枚西班牙古银币。上述遗物表明，自唐代开始，大批海船曾装载瓷器从温州港驶出，有的因避风或其他原因曾在洞头岛及附近岛屿停泊。

唐五代、宋元时期温州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促进了温州社会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扩大了城市规模，增加了人口，带来了外国的文化和技术，更刺激了温州瓷业的迅速发展。

三

明清时期，我国的瓷器生产已形成以景德镇为中心的局面。陶器主要以建筑材料为主，亦有部分陶塑工艺品、明器等。陶瓷器的装饰与图案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明清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馆藏明清瓷器在装饰和题材上手法新颖，形式各异，内容丰富，或反映家居生活，或寓意吉祥幸福，或描绘历史故事，或宣扬宗教思想。在反映民俗和社会生活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温州市郊仰义乡明朝隆庆二年项思尧夫妇墓出土的一组陶塑明器（图版147）。项思尧生前系太学生。陶塑出土时放置在项思尧墓门前，有书僮、侍女、轿夫、挑夫、杂役等陶俑，还有轿、床、衣架、毛巾架、脸盆、脚盆等日用器皿模型。陶塑人物写实生动，表情丰富，姿态各异，表现了上层人士家居与出行的生活。轿子和家具则提供了明代温州的家具和室内陈设的式样。馆藏的一件粉彩百子龙灯图瓶，器形高大，画面丰满活泼，人物动态、表情十分生动，情节令人忍俊不禁（图版170）。百子龙灯图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流行的婴戏图。“绘子儿游戏之画亦自明始，谓之耍娃娃。有五子，有九子，有十六子，有百子。百子之制，道光时尤为盛行”（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这种画面热闹红火的婴戏图案一直延续到光绪时期。温州民间素有节日观灯、舞灯、划龙舟之风，每逢元宵夜，各地花灯齐明，龙灯竞舞，热闹非凡。百子龙灯图瓶将舞灯、龙舟合为一图，形象地反映了江南地区的节庆风俗。元明时期龙泉窑大量生产各种大盘，直径达三四十厘米。这种盘是专为北方游牧民族和中东伊斯兰民族生产的。这些民族的饮食习惯是合家围坐，用手抓饭，这种大型瓷盘正是供他们盛饭用的。

馆藏瓷器中，装饰纹样带有吉祥寓意的占有很大比例，特别是清代后期作品，儿

乎大多数画面都蕴含祝愿、祈福之意。这类带有民俗吉语性质的图案，一般是由一些与吉语谐音的动物、植物或器物组合而成的。如青花方形花盆，外壁四面绘两个主题图案，一个图案为两树梅花枝干斜伸，一只喜鹊栖于梅枝上，寓意“喜上眉梢”；另一图案为两喜鹊分别栖于梧桐树干和菊花枝上，寓意“富贵同喜”；足墙镂两个如意形柿蒂纹间十字形柿蒂纹，寓意“事事如意”（图版 174）。一件作品上，往往蕴含了多重吉祥含义。另一件粉彩锦地开光花鸟纹瓶，外壁朱红色鱼子纹彩地上绘满了牡丹、菊花、梅花等花卉，这种图案叫作“锦上添花”；开光内绘牡丹梅花和两只白头翁，寓意夫妻“富贵白头”（图版 175）。粉彩花鸟纹鼓凳，凳面中央镂一方孔圆钱纹，间饰梅花、竹叶，中间绘主题图案牡丹蝴蝶纹，寓意“富贵无敌”；外壁共绘七层图案，中间一层为主题图案，梧桐树下一对凤凰卿卿我我，四周牡丹、荷花盛开，镂空双钱纹内间饰梅花、竹叶，含有“荣华富贵”、“梅竹双清”之意（图版 171）。此外，还有以瓜、蝶和花卉组成的“瓜瓞绵绵”，寓意子孙昌盛、事业兴旺；以五只蝙蝠和寿字、寿桃组成的“五蝠捧寿”象征多福与长寿；以鹤鹑（谐音“安”）和荷叶（谐音“乐业”）组成的图案象征“安居乐业”；以牡丹与猫、蝶（谐音“耄”、“耄”）组成的“富贵耄耋”，象征富贵和长寿。龙泉窑青瓷蟾蜍形砚滴，主体做成蟾蜍形，体形扁，头部高昂，背部有一圆形的进水小口，身上饰写实的圆疣。蟾蜍，在古代嫦娥奔月的美丽神话中，代表一轮皎洁的圆月，而圆月又是人间团圆的象征。以蟾蜍造型寓意生活美满、合家团圆，也可理解为祝读书人科举中第，蟾宫折桂（图版 100）。制瓷艺人还迎合社会需求，塑造了财神、寿星、福禄寿三星等各类造像，以供人们供奉祭拜。馆藏明代龙泉窑财神坐像，财神头戴方形平顶帽，表情慈祥，屈膝端坐，右手托金元宝，左手持如意，寓意财源茂盛和吉祥如意（图版 144）。另一尊寿星立于祥云莲花台上，硕额丰颐，嘴角含笑，长髯飘逸，右手握拐杖，左手持双仙桃枝，表现出寿星拄拐持桃祝愿人们长寿的慈祥和蔼神态（图版 153）。如意亦是人们喜爱的案头陈设品。它原为僧人讲经时手执之物，随佛教从印度传入。清代时成为民间流行的观赏吉祥物，多用于祝寿，以白玉、木、竹、瓷制作。如意图案近似于灵芝、祥云，象征吉祥。馆藏的一件松石绿釉双龙戏珠纹如意，雕饰精美，釉色鲜丽。两端各浮雕篆书“寿”字，中间正面浮雕主题纹饰“双龙戏珠”，扁长柄浮雕八个篆书“福”字和一只蝙蝠，寓意“福寿如意”、“吉祥富贵如意”（图版 169）。瓷器上的这类吉祥图案和瓷塑造像、陈设品带有浓厚的民俗色彩，真实地折射出明清时期的民众心理和祈望。

明清时期的宗教活动在民间比较活跃，从瓷器的造型与装饰上可窥一斑。此期佛教已在江南广为流传，寺院遍布，信徒众多。瓷器中的重要品种——各式香炉传世甚多即为例证。各种瓷塑如佛、菩萨、弥勒佛、达摩、观音造像也应运而生，品种有青瓷、白瓷、青白瓷、彩瓷、颜色釉瓷等，造型生动，形神兼具。馆藏明代龙泉窑青瓷